

元不等，涉及人数达 6 万人，自治区财政为此安排的 3 亿元专项资金。三是让基层干部公职化。一些地方实行村干部公职化管理，即参照国家公职人员管理方式，对村“两委”班子成员实行岗位绩效工资制度，并按公职人员的标准进行考核，要求坐班使其成为专职管理人员。

为提高基层干部，尤其是村党支部的社会威望，让其能够更好的在群体工作中发挥作用，地方政府多方设法给基层干部一定的权力，对其加大政治支持。如村党支部书记兼任信贷协管员（2012 年全疆有 6467 名）、任居玛寺寺管会主任等。在英吉莎县，规定所有涉农收费由乡干部收取，村党支部只负责向群众发钱（各项惠农补助资金），使村干部从以前的收钱、得罪群众的事务中解脱出来。政府通过自上而下的资源支持，树立基层干部服务群众的正面形象，增强他们的社会威望。

回溯这 20 多年新疆基层组织建设的历程，基层组织受到更多关注、承担更大责任、获得更多资源，具体表现为基层管理密度和强度增加、基层管理人员职数和任务增加、基层管理权限和内容增加，这与新疆社会稳定形势的要求及其在维护稳定中的作用不断强化有关。也由此基层组织所承担职责中，传统的“村务”管理职能相对减弱，上级政府交办的各种行政事务逐渐增大，并成为评价基层组织作用和能力的标准，基层管理中行政化趋向日益明显，基层干部的专职化或公职化的现象日渐普遍，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掌控能力在不断提升，但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上级部门仍时有对部分区域基层社会了解不足、控制乏力之感。在地方文化差异性较大，民间传统影响较深的社会，如何更好地激发基层治理活力，运用传统的基层力量，降低基层治理成本、提高治理效能，仍是需要深入探讨和不断实践的。（2017-9-7）

【网络文章】

有关新疆民族文字改革的沉痛教训

——读《历史的回声—格尔夏回忆录》

http://blog.sina.com.cn/s/blog_b3379b3f01018zam.html

杜雪巍

近日读了《历史的回声—格尔夏回忆录》（2008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版社），对其中涉及新疆民族文字改革的一章印象深刻。我为那次因为“文化大革命”而最终导致新疆民族文字改革的功亏一篑而扼腕叹息！这也可以看出，在新疆历史上，地方民族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生存土壤还是比较丰富的，其实力也是非常强大的，我们与以各种面目出现的地方民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的斗争也是长期的，艰巨的、复杂的。很多时候，这种斗争甚至是隐形的，经过伪装的。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盛世才统治新疆时期，曾在新疆的维吾尔、哈萨克和蒙古族的部分中小学里，推行过以斯拉夫文字为基础的文字改革。到 1943 年盛世才统治新疆后期，随着他与苏联关系的最终破裂，就不再使用斯拉夫文字进行少数民族文字的改革了。

1949 年 10 月 10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推进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进步，在北京成立了“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后改为“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作为国家指导文字改革的最高权威机构。改革最先是汉字的改革开始的。1955 年起，国家开始大力推广汉字简化，并制定了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汉语拼音方案”。同时，也确立了一个原则，就是帮助各少数民族进行文字改革。

1955 年 10 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为推动新疆的民族文字改革，也成立了对应的“新



疆民族语言文字研究委员会”，阿不都拉·扎克洛夫任乌鲁木齐市民族语言文字研究委员会主任，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州长贾哈达任伊犁州的民族语言文字研究委员会主任。可是他们提出的文字改革方案，竟又倒回到了盛世才统治新疆时期的以斯拉夫字母为基础的老路上。

1957年8月，全国民族工作座谈会在青岛举行，周恩来作了《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的报告。周恩来总理在会上指出：“我们反对两种民族主义——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共同目的……历史的发展给了我们民族合作的条件，革命运动的发展也给了我们合作的基础。因此，解放后我们采取的是适合我国情况的有利于民族合作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我们不去强调民族分立。现在若要强调民族分立，帝国主义就正好来利用。即使它不会成功，也会增加各民族合作中的麻烦。例如新疆，在解放前，有些反动分子进行东土耳其斯坦之类的分裂活动，就是被帝国主义利用了的。有鉴于此，在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时，我们没有赞成采取维吾尔斯坦这个名称。新疆不仅有维吾尔一个民族，还有其他十二个民族，也不能把十三个民族搞成十三个斯坦。党和政府最后确定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也同意。称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帽子’还是戴的维吾尔民族，因为维吾尔在新疆是主体民族，占百分之七十以上，其他民族也共同戴这个帽子。至于‘新疆’二字，意思是新的土地，没有侵略的意思，跟‘绥远’二字的意思不同”。（引自《周恩来选集》第259-260页）

这次在青岛召开的全国民族工作座谈会，新疆派去了赛都拉·赛普拉也夫、安尼瓦尔·贾库林、帕提汗·苏克尔巴也夫、艾斯海提·伊斯哈库夫、瓦哈甫、达夏甫、阿满土尔、维吾尔·沙依热诺、巴塔等十多位代表参加。同月，自治区党委在乌鲁木齐天山大厦召开会议，由赛都拉·赛普拉也夫等同志传达了青岛民族工作座谈会的会议精神。

1958年1月，周恩来总理又在全国政协作了《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的报告。周恩来总理进一步指出，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是：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

关于制定和推广汉语拼音方案，周恩来总理说：“汉语拼音方案还可以用来拼写普通话，作为教学普通话的有效工具。学习普通话光靠耳朵和嘴巴是不够的，学了容易忘记，必须有一套标音符号，用来编印拼音的读物和注音的字典，供学习的人随时查考不断校正自己的发音，收效才大……今后我们采用拉丁字母的汉语拼音字母，这套字母是科学技术等方面广泛使用的，大家使用和接触的机会很多，学过之后就吧容易忘记。因此，采用这套字母，对于推广普通话的工作会有很大的好处……汉语拼音方案可以作为各少数民族创造和改革文字的共同基础。我国有五十多个民族，其中有许多民族还没有自己的文字，另外一些民族虽然有文字，但是也需要改进。已有文字的民族中，除汉族用汉字外，有用藏文字母的，有用蒙文字母的，有用阿拉伯字母的，有用朝鲜字母的，还有用其他字母的。这些兄弟民族创造和改革文字的时候，应该以什么字母为基础呢？能不能就用汉字作为各民族文字的共同基础呢？过去曾经有人这样试过，没有成功，证明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如果几十个民族大家各搞一套字母，这不仅对于各族人民之间的互相学习和交流经验是个障碍，而且印刷、打字、电报设备势必各搞一套，对于各民族今后在文化教育方面的发展极其不利。……汉语现在既然决定采用拉丁字母作为拼音字母，那就应该确定这样一个原则：今后各民族创造或者改造文字的时候，原则上应该以拉丁字母为基础，并且应该在字母的读音和用法上尽量跟汉语拼音方案取得一致。可以预料，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对于各兄弟民族的创造和改革文字，以及今后各民族之间的互相学习和沟通，将有极大的利益。”（引自《周恩来选集》）

1958年4月，国家民委在北京召开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改革讨论会。会议明确规定了帮助少数民族文字改革的原则和方针，就是必须以汉语拼音方案为基础的拉丁字母进行文字改革，有文字的民族按这个统一的方针进行改革，没有文字的民族也按照这个原则创制文字。

由此可见，各种有关民族文字改革的会议是密集的，国家对各少数民族的文字改革已经逐步制定了严格的要求和原则。但是这种正确的方针政策，各省的执行的情况却并不一样。尤其是在



新疆，这个政策就没有得到贯彻与执行。

格尔夏在书中披露：1959年，自治区党委根据中央的方针作出决定：撤销原来的新疆民族语言文字研究委员会成立了以汉语拼音方案为基础的维吾尔、哈萨克拉丁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会主任先后由阿不都拉·扎克洛夫、艾斯海提·伊斯哈克夫、赛福鼎担任，赛福鼎还兼任党组书记，格尔夏担任副主任兼党组副书记，艾里哈木·艾合塔木任。会议决定，立即在部分维吾尔、哈萨克学校进行新文字改革的试点工作。

由于新文字改革方案是国家文委研究会帮助制定的，且经过大批专家、学者的反复讨论、修改，新文字改革方案已经达到了科学完善的程度，所以具体实行起来很少遇到技术性问题。但是在政府部门召开的各种新文字改革的座谈会上，新文字改革问题竟遇到了宗教及旧的习惯势力的顽强抵触和激烈反对，推行起来极其困难。

新疆石油局原副局长吉拉诺夫就借口新疆宗教界有人反对，攻击新文字改革是“卡伯尔”（异教徒）文字；还有人提出来，维吾尔文字应该以阿拉伯文字来进行改革；还有就是赛都拉·赛甫拉也夫、扎卡洛夫等人鼓吹的坚持用斯拉夫文字来进行文字改革。各种说法、借口、意见，归结起来，就是要千方百计反对以汉语拼音为基础进行的少数民族文字改革。

最后，各种反对新文字改革的意见，由格尔夏汇报到了自治区领导和王恩茂书记处，王恩茂书记当即指示说：对那些认识模糊的同志，要耐心的分析、解释，通过说服教育来提高认识。赛福鼎同志亲自出面去做民族宗教人士的工作。他严肃地向二道桥大清真寺主持阿不都拉热合曼等人指出：要认真执行共产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不能以歧视的口气把不信教的人称为“卡伯尔”，更不能说新文字是“卡伯尔”文字。

自此以后，新文字的改革工作进行的就相对顺利一些。1962年，自治区党委根据维吾尔、哈萨克文字改革试点工作的成功经验，及时作出决定：在全疆维吾尔、哈萨克等各级各类学校和全疆机关干部及广大群众中普遍推行维吾尔、哈萨克新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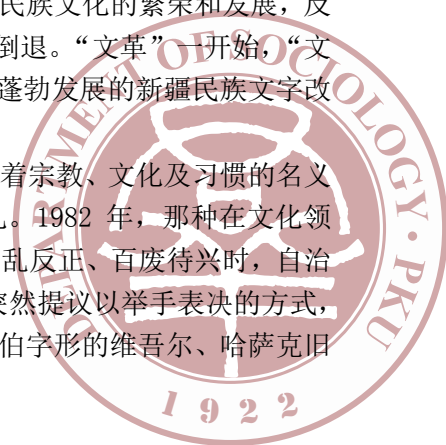
与此同时，各种新文字的教材和出版物也大量出现，以适应广大学生和青年学习的需要。各种新文字的培训班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各种媒体有关新文字改革的宣传报道也是铺天盖地。一时间，在全疆在内，很快形成了一股学习新文字的热潮。据初步统计，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学生、机关干部和社会青年中，会读、会写、会用新文字的人数就达到了130万人以上。

由此，1964年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决议，确定了以汉语拼音方案为基础的维吾尔、哈萨克拉丁文字，为维吾尔、哈萨克民族的法定文字。应该说，这种以地方立法方式定下来的事情，是不应该随意的、轻率的予以取消或废除的！

在成功推行维吾尔、哈萨克新文字的大好形势下，自治区“文改会”根据各民族群众的迫切要求，又起草了新疆蒙古族托忒文改革采用拉丁文字的方案，也为柯尔克孜族创制了拉丁文字方案。可是，这些美好的愿望正准备实施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十年“文革”，这场以文化为名议进行的革命，非但没能促进各民族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反而造成了整个中华民族的一场浩劫，导致了整个民族文化的一个巨大倒退。“文革”开始，“文改会”的工作自然瘫痪。新疆民族文字改革的进程也被迫中断，正在蓬勃发展的新疆民族文字改革工作也濒临夭折。

十年“文革”的疾风骤雨过后，一股股强大的旧的习惯势力便携着宗教、文化及习惯的名义疯狂的卷土重来，竭力围捕而来，进而要扼杀这个新文字改革的婴儿。1982年，那种在文化领域的种种倒行逆施的恶行已经结束了六年之后，全国各行各业均在拨乱反正、百废待兴时，自治区召开的第四届人大常委会上，赛都拉·赛甫拉也夫竟又旧话重提，突然提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最终以少数服从多数，废除了维吾尔、哈萨克拉丁新文字，恢复阿拉伯字形的维吾尔、哈萨克旧



文字。

历史再一次以貌似客观、民主的方式对中央的正确方针、政策进行了一次耍弄！而且是以人大常委会举手表决的方式，是以多数人赞成的规则通过的。由此可见，当时这种地方民族主义的势力是何等的强大！

作者格尔夏也愤懑的诘问，“至此，新疆民族文字改革的巨大成果，被完全、彻底地取消和否定。新疆的民族文字改革工作夭折了，新疆民族文化进步的列车被拉上了历史的倒车。……这是历史的大倒退！这是新疆各族人民的悲剧。它使新疆的维吾尔、哈萨克、蒙古族的人民丧失了一次与祖国人民和世界文化接轨的绝好机会……在全国正在兴起的改革浪潮中，新疆竟出现这种逆流而动的反对文字改革的怪事，岂不是令人感到匪夷所思？”

的确，语言、文字是人们相互交流相互传递思想感情的载体，是一个民族的徽记，是人们进行沟通、交流的媒介。人类社会之所以能够和谐、有机地运行，就是靠彼此相通的语言文字。彼此相通的语言文字，可以加强各民族之间的沟通 and 理解，减少偏见和隔阂，走向共同进步，实现共同繁荣。但是，1982 年的那次人代会却使维吾尔、哈萨克、蒙古族的人们丧失了一次与祖国文化和世界文化接轨的绝好机会。

那是一次教训极为惨痛新文字的改革，我们希望在历史的时期，在全国 19 省市大力援疆的形势下，在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确立的促进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大背景下，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可否再来一次拨乱反正，大张旗鼓的制止倒退，让新疆的民族文字改革重新走上阔步前进的正确道路！

(2011 年 8 月 12 日)

【书讯】

二十一世纪中国民族问题丛书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体制与运行研究》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年 5 月

蒋力蕴 著

目 录

导 论

第一节 论文的设计和方法

第二节 对兵团研究的有关文献回顾

第一章 边缘地区开发的模式比较

第一节 前工业化时期

第二节 向工业化过渡时期

第三节 工业化时期

第四节 向后工业化过渡时期

第五节 不同时期影响核心地区对边缘地区控制方式的因素

第二章 嵌入模式：屯垦开发新疆的历史发展

第一节 我国历代开发边缘地区制度的回顾

第二节 我国屯垦及屯垦思想的历史回顾

第三节 新疆屯垦的主要特征

第四节 嵌入模式的逐渐形成

